

# 社会信任分异: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研究

王毅杰,丁百仁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利用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差于市民,信任分异是他们行为选择的产物,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经验、道德价值、资源保障等方面的相对悬殊。其中,社会交往、乐观主义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都有正向作用,但具体机制不同;社会地位仅对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影响显著。相比之下,社会地位高低是影响农民工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市民,社会交往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在城市信任培育过程中,除了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社会交往和形塑道德观念入手之外,还应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社会信任;可信基础;失信承担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7)02-0110-09

DOI: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17.02.015

## 一、问题的提出

从远古至今,信任一直存在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任何形式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均需要信任。20世纪初,齐美尔首次将信任引入社会科学时就指出,“信任是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如果人们之间没有最起码的信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随后,卢曼发现,“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的简化机制”<sup>[1]</sup>。福山认为,“信任是重要资本,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sup>[2]</sup>。尤斯拉纳也把信任比喻为“社会生活的鸡汤”<sup>[3]</sup>。以上学者虽然观点有别,但均表明了信任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作用。因置信对象和链接纽带不同,信任有着众多类型。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首次依据“二分建构法”区分了两种最基本的形式: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家族和准家族关系上,指向相识之人;后者又称社会信任,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指向多数人或陌生人,将信任置于一个两极相对的单一维度上。更为重要的是,在韦伯看来,信任类型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统一和符应的一面,从特殊信任到社会信任的变化也就体现了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发展意涵<sup>[4]</sup>。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的信任环境和模式发生了巨变,特别是城市。在城市,伴随着结构分化、人口流动增强,发生于团体内的特殊信任显著减少,而社会信任不断增加,其作用范围延伸至经济、社会和管理活动,并且愈发重要。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陌生化,人们似乎普遍觉得彼此之间的信任下降了,城市的社会信任严峻,人们之间的合作需要更高的信任度来维持<sup>[5]</sup>。因此,维系城市和谐的重要纽带——社会信任,俨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再加上,近年来,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变,201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达2.74亿。农民工和市民已成为当下城市空间长期共存的两大群体,他们的社会信任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总体信任局面,亟待关注<sup>[6]</sup>。

然而,从现有的信任问题研究来看,虽涌现出许多丰富成果,有对市民的社会信任、农民的社会信任探讨,也有通过跨国调查数据,对中国人整体信任水平及与其他文化体下居民信任状况的比较,但农民工社会信任研究比较欠缺,更不用说其与他群比较了<sup>[5-9]</sup>。正如刘爱玉、刘明利所指出的,“近

[收稿日期]2016-12-2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15B24914)、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科研资助项目(BRA2015404)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毅杰(1973-),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

年来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覆盖众多领域,但鲜有涉及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对于农民工这么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而言,理应有更多关注”<sup>[10]</sup>。同时,从比较视角加强认识和理解也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的题中要义,有助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sup>[11]</sup>。因此,本研究将以南京市为例,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信任是施信者对他人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预期,涉及两个方面的行动者:施信者和信任对象。与特殊信任不同,在社会信任中,施信者不认识信任对象,更别提具象经验。因此,信任对象的信息无从获知,信任与否取决于特定场域的施信者。在现代社会,由于公民理性的觉醒,当面对信任“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人”时,大多采取理性策略。作决策时,施信者通常假想一个潜在信任对象,综合思考两方面情况:一是对失信可能性的主观认知,着眼于信任对象的可信度估计及评判依据,称为“可信基础”,二是对失信代价性的自我估量,着眼于施信者的抗风险能力及承受程度,称为“失信承担”<sup>[12-14]</sup>。

一方面,施信者做出怎样的可信度估计,哪些因素影响可信基础?在不同理论预设下,答案迥异。制度与文化论都将个体依附的宏观背景视为人们失信可能性预估的评判理据,但两者关注点不同。制度论的口号是“制度决定”,健全的制度设置能减少信任滥用和失信损失,提升可信预估。而文化论认为信任代表一种文化,信任差异由个体所处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所致<sup>[12]</sup>。与之不同,交往论、道德论和心理理论侧重微观分析。其中,交往论重视个人的生活经验,认为信任嵌入于人际交往,交往中形成某种知识,构成个别信任的识别依据,而且它还桥接普遍信任,让我们信任陌生人。道德论区分了策略主义和道德主义信任,前者指个别信任,后者为不涉及对具体人的信任,是一种对人性的普遍看法,信任与否基于乐观主义。社会信任属于道德主义信任,乐观者倾向于信任陌生人。心理理论认为信任内生于人格系统,人格不同致使信任差异,而人格是个体在生活中形成的认知、情感、意志的统合模式<sup>[3]</sup>。

另一方面,施信者的失信承担受限于什么,又如何关联信任决策?代表性解释是资源因素论。该理论认为,相对易损性是施信者对陌生人失信可能带来的损失有多大承受能力,其大小取决于潜在损失的绝对值在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中占多大比重,而根据相对易损性,即使失信承担不同的人对信任对象可信度做出相同判断,他们仍会有不同信任行为。所以,可信基础固然重要,失信承担也不可忽视。失信承担与社会成员获得的资源多寡密切相关,这些资源大体分为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财富,建立在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而个人资源取决于社会地位、关系资本等<sup>[5]</sup>。通常,缺乏资源的人不易产生信任,因为他们的“灾害线”比较低,若对方失信,带来的代价和风险难以承受;而资源丰富者则相反<sup>[12]</sup>。

综上,它们可梳理为宏观和微观层次因素,前者包括制度论的社会制度、文化论的文化类型、资源因素论的公共资源;后者包括交往论的社会交往、道德论的乐观主义、心理理论的人格特质、资源因素论的个人资源(图1)。宏观因素强调系统背景的重要性,可解释不同社会的信任高低,但无法回答同一社会群际间信任差异;后者恰好相反<sup>[12]</sup>。因此,要区分情境:当分析为何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信任度高时,应从制度、文化、公共资源等宏观因素来解读;而探讨为何同一社会,有的人比其他社会信任度高时,应从微观因素来分析,比如社会交往、乐观主义、个人资源<sup>[15]</sup>。

面对同一城市空间的农民工和市民,本文将从微观层次去探寻他们的信任形成与差异,同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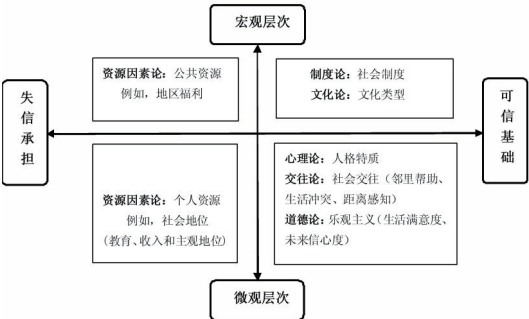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信任形成与分异的解释框架

社会学视角与心理学不同,后者侧重人格特质,而社会学虽不拒斥之,但更关心制度环境、文化道德(如乐观主义)、社会交往、个人资源(如社会地位)。结合以上两点,本文主要选取代表可信基础的社会交往、乐观主义和体现失信承担的社会地位进行解读。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尝试回答:1.对于身处同一城市空间的农民工和市民,他们的社会信任状况如何?是否存在差异?2.代表可信基础和失信承担的微观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和市民社会信任的形成与差异?社会信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嵌入式”特点,它不仅取决于信任情境中行动者的特征及相互关系,也受制于信任情境自身特征。农民工是一个跨越了乡一城的流动群体,走出农村,迈进城市,即意味着脱离了熟人社会的信任环境,进入生人社会。在此环境中,农民工多从事累、苦、脏的底层工作,时常遭遇同工不同酬、工资克扣拖欠等不公待遇,而且生活交往呈现“内卷化”特点,还饱受歧视,这些深刻影响农民工信任,可能面临信任危机<sup>[16]</sup>。相比而言,市民社会处境和生活体验明显要好,也较少受人格信任束缚,同时市民关系网络的异质性、广泛性也增加社会信任。提出:

假设1:农民工社会信任显著差于市民。

同时,由于基于群体实际的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差异比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农民工和市民的信任分布与差异。接下来,将根据前文的研究框架,建构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关系的相关假设。

作为影响信任决策的一方,可信基础来源众多。本文立足微观层次,选取交往论的社会交往和道德论的乐观主义作为反映指标。二者影响机制不同,社会交往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强调“经过概括”的交往经验。哈特、西佛尔和赛利格曼指出,信任来自社会交往的美好经历,我们建立的紧密的友好关系为发展对陌生人的信任起到了示范作用。而乐观主义是自上而下的分析,将信任与积极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联系起来,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们也应该对他人感觉良好<sup>[3]</sup>。两者均对人们的社会信任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从国内以往研究来看,社会交往因素关注得较多,而乐观主义近乎缺位,我们添加了这一重要影响变量。提出:

假设2:对农民工或市民,越具有美好的社会交往,社会信任越高。本文的社会交往包括邻里帮助、生活冲突和距离感知。

假设2a:农民工或市民的邻里帮助越多,社会信任越高;

假设2b:农民工或市民的生活冲突越少,社会信任越高;

假设2c:农民工或市民的距离感知越小,社会信任越高。

假设3:对农民工或市民,越具有积极的乐观主义倾向,社会信任越高。本文的乐观主义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度。

假设3a:农民工或市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社会信任越高;

假设3b:农民工或市民的未来信心度越好,社会信任越高。

信任是一种预期判断,结果检验在未来,信任他人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一场赌局之中,风险与收益并存,特别在社会信任中,信任对象的不具体和不确定性,更是让风险指数有增无减。所以,除却可信基础,失信承担也左右信任决策。社会地位是失信承担的重要指标,代表个体在社会结构的位置,其高低与资源获取紧密相关。帕特南认为,人际信任在社会地位上具有很强的等级性,地位高者表现出更高信任<sup>[3]</sup>。胡荣的研究也表明,地位高者对他人的信任度也越高,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是社会交往中占优势的人,更能主动信任他人,而且别人对他失信的代价会增大,即便对方失信,相对易损性也是比较低的<sup>[7]</sup>。提出:

假设4:对农民工或市民,社会地位越高,社会信任越高。本文的社会地位包括教育、收入和主观地位。



假设4a:农民工或市民的教育年限越长,社会信任越高;  
假设4b:农民工或市民的收入越多,社会信任越高;  
假设4c:农民工或市民的主观地位越高,社会信任越高。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分布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研究”课题组于2014年在南京市进行的城乡居民社会状况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5—55岁、从事非农工作的南京市民和农民工。对市民,我们以南京小区均价为标准,进行多阶段抽样。首先从南京11个城区随机抽取鼓楼、白下和建邺3个城区,然后将选中城区的所有小区按均价排序,根据等距抽样原则,从小区抽样框抽取9个小区,共27个小区。再按随机数表从每小区抽取14户。户内抽取生日最靠近1月1日的为被访者。对农民工,我们采用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配额的抽样方法。有效回收市民问卷376份,农民工问卷443份。因变量是社会信任。学界一般采用“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或“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您一不小心,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来测量。本研究中具体题项设置为“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您同意吗?”,回答项是“非常反对,有点反对,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纳入模型时,转化为二分变量,前两项合并赋值“0=反对”,后两项合并赋值“1=同意”。自变量包括社会交往、乐观主义、社会地位和人口变量。其中,社会交往区分为交往经历和交往感受。交往经历包括邻里帮助和生活冲突,分别用“当您急需帮忙时,可以从邻居那里得到吗?”和“在城市,您和别人(因风俗习惯)起过冲突吗?”测量。交往感受指社会距离感知,由愿不愿意“与您一起聊天、与您一起工作、与您讨论工作难题、与您做朋友、与您做邻居、与您一起参与社区管理、与您孩子在一个班上学和与您家通婚、做亲戚”8项构成的量表测量,分别询问农民工对市民和市民对农民工的交往印象。乐观主义代表了一种积极的道德信念,尤斯拉纳指出它包含未来比过去好,相信可以控制自己的环境使它越来越好,个人有幸福感和社群有支持作用<sup>[3]</sup>。本文选取未来信心度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用四分量表中的“我对未来很有信心、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测量。社会地位区分为主、客观社会地位。客观地位用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测量,分析时,收入取自然对数;主观地位询问被访者对所处地位的自我判断,问卷将主观地位划为10个等级,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顶层。人口变量有性别和年龄。各变量的情况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 变 量      |         | 类型及分布(百分比/均值)                                  |                                                |
|----------|---------|------------------------------------------------|------------------------------------------------|
|          |         | 农民工(N=443)                                     | 市民(N=376)                                      |
| 人口<br>变量 | 性别      | 男, 63.7; 女, 36.3                               | 男, 48.7; 女, 51.3                               |
|          | 年龄(岁)   | 26.43 (8.16)                                   | 37.09 (8.78)                                   |
| 社会<br>地位 | 教育年限(年) | 11.17 (2.79)                                   | 14.12 (2.47)                                   |
|          | 年收入(万元) | 4.83 (3.54)                                    | 6.77 (4.47)                                    |
|          | 主观地位    | 3.80 (1.75)                                    | 4.48 (1.86)                                    |
| 社会<br>交往 | 邻里帮助    | 不可以或少数时候, 40.0;<br>多数时候可以, 39.5;<br>一定可以, 20.5 | 不可以或少数时候, 34.6;<br>多数时候可以, 41.2;<br>一定可以, 24.2 |
|          | 生活冲突    | 没有, 79.7; 有, 20.3                              | 没有, 78.5; 有, 21.5                              |
|          | 距离感知    | 15.94 (4.21)                                   | 14.98 (4.15)                                   |
| 乐观<br>主义 | 生活满意度   | 2.86 (0.69)                                    | 2.95 (0.62)                                    |
|          | 未来信心度   | 3.37 (0.64)                                    | 3.18 (0.62)                                    |
| 社会信任     |         | 信任, 51.2; 不信任, 48.8                            | 信任, 71.3; 不信任, 28.7                            |

注: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四、主要研究发现

(一)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

社会信任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放心”或“认同”的积极心态,是城市和谐发展的资本和保障,也是

现代新型城市发育成熟的前提和标志。当前,农民工与市民构成此社会空间中的两大群体,他们的社会信任如何,是否有差异?笔者探讨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见表2)。结果表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分布有着显著的统计差异。面对“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您同意吗?”,农民工和市民作出的回答不尽相同:在农民工中,选择“非常反对”、“有点反对”、“比较同意”、“非常同意”的占比依次为9.3%、39.5%、45.6%、5.6%,而在市民中,其占比依次为5.3%、23.4%、60.1%、11.2%。而且,这一比例分布状况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皮尔逊卡方检验。

表2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的分布差异(%)

|         | 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您同意吗?      |           |        |
|---------|----------------------|-----------|--------|
|         | 农民工(N=443)           | 市民(N=376) | 农民工—市民 |
| 非常反对    | 9.3                  | 5.3       | 4.0    |
| 有点反对    | 39.5                 | 23.4      | 16.1   |
| 比较同意    | 45.6                 | 60.1      | -14.5  |
| 非常同意    | 5.6                  | 11.2      | -5.6   |
| 皮尔逊卡方检验 | $X^2=36.43, p<0.001$ |           |        |

通过比较发现,一方面,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都处于一般偏高的水平,他们表示“同意”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但另一方面,农民工的信任水平要明显低于市民,其表示“不同意”的比例要比市民高出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民工的防备心理相对较强,更不容易轻信陌生人。假设1得到支持。从信任的环境和模式来看,与多数市民不同,农民工经历着场域转换,从熟悉的乡土社会跨入陌生城市,告别了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熟人信任,而且他们多数人城市适应能力不太强,现代素养也尚不具备,社会信任的塑造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因此,他们在迁入地的信任状况相对较差,部分学者甚至发出农民工信任危机的强烈呼声<sup>[17]</sup>。

表3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的代际差异(%)

|         | 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您同意吗?    |           |        |                     |           |        |
|---------|--------------------|-----------|--------|---------------------|-----------|--------|
|         | 老一代(N=305)         |           |        | 新生代(N=514)          |           |        |
|         | 农民工(N=83)          | 市民(N=222) | 农民工—市民 | 农民工(N=360)          | 市民(N=154) | 农民工—市民 |
| 非常反对    | 10.9               | 5.4       | 5.5    | 8.9                 | 5.2       | 3.7    |
| 有点反对    | 33.7               | 20.7      | 13.0   | 40.8                | 27.3      | 13.5   |
| 比较同意    | 45.8               | 60.8      | -15.0  | 45.6                | 59.1      | -13.5  |
| 非常同意    | 9.6                | 13.1      | -3.5   | 4.7                 | 8.4       | -3.7   |
| 皮尔逊卡方检验 | $X^2=9.80, p<0.05$ |           |        | $X^2=13.83, p<0.01$ |           |        |

笔者还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分异同样体现在代际层面(见表3)。一方面,无论是农民工内部,还是市民内部,老一代的社会信任水平均高于新生代。这可能与他们成长的时代环境、社会氛围和早期经历有关,相比之下,成长于改革开放和转型加速期的新生代,较少经历传统美德的熏陶和实践,反而更多地受到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负面冲击(比如投机主义、杀熟事件),也更加频繁地接触网络负面信息。另一方面,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均低于市民,但彼此之间的信任差异随着世代而发生变化,他们在新生代中的信任差异相对较小。而这除了受到不同“代”的外在环境(比如时代风貌、文化观念)的影响之外,更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有关,他们的教育程度较高、农村经历较少、进城时间早而长、适应能力较强,思想认知和行为模式也朝现代性转向,因此,与同“代”市民的信任差异会变小。

(二)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及比较

为进一步澄清农民工与市民的信任差异,需要把握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本文提出的研究框架指出,社会信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们主要围绕可信基础和失信承担两个方面展开,既有宏观的制度、结构和文化因素,也有微观的个人特征、社会地位、交往经验和道德信念等。笔者立足微观层次,选取了人口特征、社会地位、社会交往和乐观主义的道德信念,来探讨影响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的因素及差异(见表4)。

表4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的二元 Logistic 模型

|      | 农民工模型(N=443)              |           |       |         | 市民模型(N=376)               |           |       |         |
|------|---------------------------|-----------|-------|---------|---------------------------|-----------|-------|---------|
|      | 变量                        | B         | S.E   | Exp (B) | 变量                        | B         | S.E   | Exp (B) |
| 人口变量 | 性别                        | 0.285     | 0.224 | 1.330   | 性别                        | -0.309    | 0.256 | 0.734   |
|      | 年龄                        | 0.042**   | 0.015 | 1.043   | 年龄                        | 0.034*    | 0.015 | 1.035   |
| 社会地位 | 教育年限                      | 0.140***  | 0.041 | 1.150   | 教育年限                      | 0.015     | 0.057 | 1.015   |
|      | 收入对数                      | -0.128    | 0.190 | 0.880   | 收入对数                      | 0.162     | 0.229 | 1.175   |
|      | 主观地位                      | 0.148*    | 0.063 | 1.160   | 主观地位                      | 0.008     | 0.075 | 1.008   |
| 社会交往 | 邻里帮助(以少数或不可以为参照)          |           |       |         | 邻里帮助(以少数或不可以为参照)          |           |       |         |
|      | 多数可以                      | 0.174     | 0.230 | 1.190   | 多数可以                      | 0.908***  | 0.278 | 2.479   |
|      | 一定可以                      | 0.482+    | 0.283 | 1.619   | 一定可以                      | 0.806*    | 0.344 | 2.240   |
|      | 生活冲突(以没有为参照)              |           |       |         | 生活冲突(以没有为参照)              |           |       |         |
|      | 有                         | -0.675**  | 0.257 | 0.509   | 有                         | -0.352    | 0.289 | 0.703   |
|      | 距离感知                      | 0.027     | 0.026 | 1.028   | 距离感知                      | -0.069*   | 0.031 | 0.933   |
| 乐观主义 | 生活满意度                     | 0.295+    | 0.161 | 1.344   | 生活满意度                     | 0.209     | 0.231 | 1.232   |
|      | 未来信心度                     | 0.381*    | 0.174 | 1.464   | 未来信心度                     | 0.423+    | 0.231 | 1.526   |
|      | 常量                        | -5.748*** | 1.198 | 0.003   | 常量                        | -2.064    | 1.364 | 0.127   |
|      | X <sup>2</sup>            | 47.457*** |       |         | X <sup>2</sup>            | 37.634*** |       |         |
|      | -2Likelihood              | 556.380   |       |         | -2Likelihood              | 406.050   |       |         |
|      | Cox&Snell R <sup>2</sup>  | 0.103     |       |         | Cox&Snell R <sup>2</sup>  | 0.097     |       |         |
|      | Nagelkerke R <sup>2</sup> | 0.138     |       |         | Nagelkerke R <sup>2</sup> | 0.139     |       |         |

注:\*\*\*<0.001; \*\*<0.01; \*<0.05; +<0.1。

1. 社会地位的影响

表4显示,教育年限的系数在农民工和市民模型都是正值,但系数仅在农民工样本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教育仅对农民工社会信任影响显著,其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倾向信任的发生比率增加0.150个单位。假设4a得到部分支持。笔者认为,教育的正向作用除了通过改善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增强失信风险的承担能力,亦通过改变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提高可信评判来实现。然而,收入对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假设4b未得到支持。尤斯拉纳曾经指出,以往研究也表明教育有很强的预测作用,收入却不重要,这对信任的大多评估都是如此<sup>[3]</sup>。

与教育年限类似,主观社会地位也只对农民工社会信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主观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倾向信任的发生比率增加0.160个单位。假设4c得到部分支持。笔者认为,在主观地位判定时,农民工往往将职业、收入、教育、网络都考虑在内,主观地位越高者预示更多资源和自信,进而提高“灾难线”和信任预估<sup>[12]</sup>。

通过比较发现,社会地位仅对农民工社会信任影响显著,而对市民无明显作用。这可能与两者的社会位序特征及后果有关,当人们处于低位,经不起折腾时,往往谨小慎微,优先思量自己承受失信代价的能力(比如地位、资产),并且砝码加重。相比市民,农民工大多位于城市底层,因此,信任决策时,社会地位的影响更为凸显。

2. 社会交往的影响

总的来说,社会交往对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具体作用机制不同。首先,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邻里帮助都能有效提升其信任状况。统计结果表明,在农民工模型,相比“少数或不可以”获得邻居帮助者,“一定可以”获得帮助的市民社会信任更高,是前者的1.619倍;在市民模型,相比“少数或不可以”获得邻居帮助者,“多数或一定可以”获得帮助的市民社会信任也更高,分别是前者的2.479倍和2.240倍。而且,由它们的回归系数可知,此效应市民要高于农民工。假设2a得到支持。这是因为,能够获得邻里帮助的人往往形成美好的人际印象、互动经验和认知基础,而且还会带来“溢出效应”和“传染效应”,容易对一般化他人产生好感,增强社会信任。

其次,生活冲突明显降低农民工信任水平,而对市民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在农民工模



型中,生活冲突的系数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为负值,即相比“没有”和别人起过冲突者,“有”生活冲突的农民工社会信任更低,其倾向于信任的发生比率是前者的 0.509 倍。而在市民模型,生活冲突变量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即其对市民信任影响不太显著。假设 2b 得到部分支持。这是因为,本文的生活冲突主要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良互动经历,相比市民,农民工从乡土社会进入异质性的城市,不仅与农村固有惯习差异较大,容易诱发文化震荡和冲突,而且每次冲击也会很大,不理解或欺负感明显,强化陌生感和外来感,影响更显著。

第三,社会距离明显降低市民信任水平,而对农民工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在市民模型中,距离感知的系数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为负值,即距离感知每增加 1 个单位,其倾向于信任的发生比率是原来的 0.933 倍。而在农民工模型,距离感知变量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即其对农民工信任影响不太显著。假设 2c 得到部分支持。这是因为,社会距离对两者的认知、心态和意义不同。在相对优越的市民看来,它不仅指不愉快的交往感受,更带有歧视或偏见的主观成分,因此会放大距离感知的消极作用,比如怀疑、拒斥,带来不信任感。而对农民工,其距离感知虽是被歧视、被排斥的某种反映,但他们平时也主动隔离(比如交往的内卷化),与市民生活近乎平行,因而消极影响没想象得那么大。

3. 乐观主义的影响

乐观主义也对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信任都有显著影响,且具体作用机制不同,支持了尤斯拉纳的道德基础论:信任是一种道德价值,它反映一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sup>[3]</sup>。

乐观主义代表了一种积极的道德信念,其作用通过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度表现出来。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生活满意度系数都是正值,但系数仅在农民工样本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生活满意度仅对农民工社会信任影响显著,其对目前生活越满意,社会信任越高。假设 3a 得到部分支持。这是因为,相比市民,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境遇改善更明显,且多以昔日农村生活为参照点,因而带来的满足感更强,影响更大,有利于信任培育。未来信心度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都有明显促进作用。统计结果表明,未来信心度的系数在农民工与市民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其中,未来信任度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民工倾向于信任的发生比率增加 0.464 个单位,市民倾向于信任的发生比率也增加 0.526 个单位。假设 3b 得到支持。这是因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是比较乐观的,也更容易对外界(他人)持有美好感觉和认知,进而奠定牢固的可信基础。

4.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贡献比较

表 5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改进量<sup>①</sup>

|                     | 农民工模型        | 市民模型         |
|---------------------|--------------|--------------|
| 控制变量                | 0.006(0.008) | 0.008(0.011) |
| 控制变量+社会地位           | 0.057(0.076) | 0.019(0.027) |
| 控制变量+社会地位+社会交往      | 0.080(0.107) | 0.079(0.113) |
| 控制变量+社会地位+社会交往+乐观主义 | 0.103(0.138) | 0.097(0.139) |

注:括号内为 Nagelkerke R<sup>2</sup>,而ΔCox&SnellR<sup>2</sup>表示增加量。

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统计表明,在农民工模型,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的改进量最大(ΔCox&SnellR<sup>2</sup> = 0.051),其次是社会交往(ΔCox&SnellR<sup>2</sup> = 0.023)和乐观主义(ΔCox&SnellR<sup>2</sup> = 0.023);而在市民模型,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改进量最大(ΔCox&SnellR<sup>2</sup> = 0.060),其次是乐观主义(ΔCox&SnellR<sup>2</sup> = 0.018)和社会地位(ΔCox&SnellR<sup>2</sup> = 0.008)。可见,地位高低是影响农民工信任的关键因素,而对市民,社会交往的作用更重要。换句话说,农民工社会信任的高低更多

①鉴于二元 Logistic 模型间系数比较的可能误差,一种可能方法是运用线性回归来分析二分因变量,以便相互佐证(详见洪岩璧《Logistic 模型的系数比较问题及解决策略:一个综述》,《社会》,2015 年第 4 期)。我们也进行了验证,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在农民工模型中,相应的 R2(调整 R2)依次为 0.006(0.001)、0.057(0.046)、0.080(0.061)、0.104(0.080);在市民模型中,相应的 R2(调整 R2)依次为 0.008(0.002)、0.019(0.006)、0.082(0.059)、0.099(0.071)。该发现与已有二元 Logistic 模型具有一致性,表明社会信任各影响因素的相对作用大小是比较稳健的。

受限于失信承担,而市民则取决于可信基础。

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一区别首先体现出两者的思维特点:面对以绝大多数人或陌生人为对象的社会信任问题,市民主要关心“对方的可信度大小”,寻找说服自身的缘由,倾向于“好”的思量;而农民工重点考虑“对方失信的代价大小”,反思自己的承受能力,倾向于“坏”的打算。深层次原因离不开他们各自的结构处境和生活场域。从结构处境来看,在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国家赶超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人群的生活境遇。这一制度不仅包含身份识别、人口统计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包括诸多权利与经济利益的配置功能。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设置下,农民工沦为了“二等公民”,其和市民在就业、福利、保障、生活等机会,乃至权利享有、身份平等、尊严保障等方面差异显著<sup>[18]</sup>。近年来,尽管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驱动下,户籍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先前户籍带来的种种不公或弊端仍清晰地折射在农民工身上,更何况目前户籍改革的权利释放还亟待进一步加大。所以,对于深受资源瓶颈和制度保障网相对欠缺的农民工,当面临信任决策时往往优先思量失信的代价及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并给予其较大权重,在生人社会更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人们处于“高位”,认为失信的损益变得可以承受,甚至微乎其微时,可信基础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反之,当处于“低位”,经不起折腾时,就会谨小慎微,优先考虑失信的代价,并放于首要地位,更有甚者,若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很难设想他会冒险相信<sup>[19]</sup>。

从生活场域及其带来的(认知、情感)体验来看,对广大农民工,城市是一个陌生暂居点,作为务工经商的“外人”,其对努力赚钱的追求远甚于城市生活的经营。这一理念使得该群体进行行为选择时(如信任判断)同样遵循如上原则,将社会选择的可能损益,尤其是成本、代价,给予更大砝码,更强调“控制为基”的信任观;而对市民,城市不仅是工作之地,更是长久居所,作为城市生活的“主人”或“扎根者”,经营生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交往、联系是社会性个体生活的本质特征之一,具有基础性意义,在该理念引领下,面临行为选择时(如信任判断),交往经验的地位便会凸显,更强调“互动为基”的信任观,而且,相比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制度保障和生活机遇上具有优势,也降低了失信承担的相对损耗<sup>[13]</sup>。

## 五、结论与启示

社会结构与信任类型关系密切。传统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形成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信任对象限于熟人圈,而现代城市是生人社会,人们需要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社会信任问题凸显并影响深远。为此,本文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均位于一般偏高水平,但农民工信任显著差于市民。结合表1的描述统计发现和相关经验研究可知,农民工较低的信任水平主要源自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社会地位是影响农民工信任的关键因素,也是失信承担的有力保证。相比市民,农民工的教育、收入和主观地位较差,“灾害线”偏低,经不起失信风险。社会交往和乐观主义对农民工与市民信任影响都较大,也是可信基础的重要来源。他们在乐观主义上相差无几,但农民工的交往状况差于市民,不仅邻里帮助较少,距离感知较大,而且生活冲突的影响更为显著,降低了信任决策的可信基础。

社会信任是城市生活的润滑剂,其总体局面取决于群际的信任分布。然而,这不单是一个行为选择问题,更嵌入了地位结构、交往经验、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等丰富内涵。本文具有如下启示:首先,提高市场能力,改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及获得的资源多寡能够显著改变农民工信任水平。已有的研究认为,制度阻隔使得多数农民工排斥于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程度、职业培训、政策扶持等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政府可加大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保障制度等改革力度,保障公正环境。同时,提供继续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通道,开展免费职业培训运动,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

其次,倡导互助互谅,打造和谐共处局面。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积极互动都能带来美好经历和态度认知,提高社会信任。城市的社会联结相对缺失,原子化、个体化倾向凸显,人们时常面临



无助和纠纷增加,作为外来人的农民工更是较少支持、帮助,还常与市民发生矛盾、冲突。政府和社会可从思想和活动取向着力,加强理解、团结、互助为内容的美德教育,表彰“好人好事”的道德模范及事迹,开展“献爱心”等帮扶活动。

第三,提升城市包容性,营造健康氛围。距离感知是包容性的重要指标,显著制约着市民的社会信任。当前,城市不同户籍、职业、身份的人群之间依旧存在偏见、排斥和歧视/被歧视行为,负面情绪弥漫。政府和社会可宣传和引导平等、宽容、开放的认知理念,正确宣传不同群体的信息、表现和形象,搭建彼此交流的契机和平台等。

最后,增强获得感和信心度,形塑乐观态度。乐观主义是社会信任的道德基础,能够对他者秉持积极认知和评判,有助于提升农民工与市民的信任水平。当前,人们的乐观主义倾向有很大改进空间,政府可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来降低社会不平等,实施就业、创业、扶贫计划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改善生活机遇。同时,政府也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己,树立合理的参照和目标。

#### [ 参 考 文 献 ]

- [1] 史晓浩,王毅杰.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信任的建构机制:一种情境的解释[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89-96.
- [2] [美]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彭志华,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208.
- [3] [美]埃里克·尤斯拉纳. 信任的道德基础[M]. 张敦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50, 103.
- [4] [德]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291-294.
- [5] 敖丹,邹宇春,高翔. 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J]. 社会, 2013(6):161-179.
- [6] 王毅杰,周现富. 城市居民信任的差序格局[J]. 天府新论, 2009(2):102-105.
- [7] 胡荣. 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5(2):46-51.
- [8] 刘澈元,苏毓敏,徐晓伟. 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探讨[J]. 经济地理, 2013(8):26-30.
- [9] Bomhoff E J, Gu M M L. East Asia Remains Different A Comment on the Index of “Self-Expression Values,” by Inglehart and Welzel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2(3):373-383.
- [10] 刘爱玉,刘明利.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2):78-84.
- [11]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15-22.
- [12] 王绍光,刘欣. 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 社会学研究, 2002(3):23-39.
- [13] 谢坚钢. 嵌入的信任:社会信任的发生机制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102-107.
- [14] Buskens V, Weesie J. An Experiment on the Effects of Embeddedness in Trust Situations: Buying a Used Car[J].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000, 12(2):227-253.
- [15] 马得勇. 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J]. 开放时代, 2008(4):72-86.
- [16] 王毅杰,丁百仁.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幸福感——一项探索性研究[J]. 社会发展研究, 2014(2):92-113.
- [17] 张连德. 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生成原因与对策思考——基于皖北D县的调查[J]. 西北人口, 2011(5):90-94.
- [18] 王毅杰,蔡文强.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61-67.
- [19] 王学芳. 信任的社会心理学分析[J].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5(5):68-69.

(责任编辑 卢 虎)

and a place to create knowledge. ③thinking space. Regarded as a conjecture, business model is an understanding or image about how decision maker, designer or performer use specific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CRE evolution model explains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bout business model conje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entity, and also discusses the newly-emerged issues on business model.

**(12) Inequality in childhood : a fieldwork study on the playing culture of migrant children**

*XIONG Chun-wen, XIE Tong-hua · 100·*

Based on my two-year fieldwork, I investigated the playing culture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non-migrant children in XL primary school in Beijing. M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ying culture between separate class and mixed class in XL. The separate class' playing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no rules" while the mixed class "prudish". Besides, the mixed class has various play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These differences show an inequality in childhood. Class is a more cogent reason than "Hukou" behind the differences.

**(13) Difference in social trust : a comparison between farmer workers and urban citizens**

*WANG Yi-jie, DING Bai-ren · 110·*

Using the data on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in 2014, we compare the social trust between farmer workers and urban citize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er has less social trust than the latter, which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ir difference in life experience, morals, and social securit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optimism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both farmer workers and urban citizens. Social status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armer workers onl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matters more to urban citizens. To build up social trust, we need to take various factors into account including social status, interaction, morals and individual preferences.

**(14) Impact of grand-parenting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 difference between migrant and non-migrant elderly**

*JIN Xiao-yi, LIU Yan-jun · 119·*

Life satisfaction is a well-studied topic in gerontology research, but research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grand-parenting in the ongo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scarce. Using data from surveys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parents in Shenzhen in 2013 and the rural elderly in Y County in 2015, we find that grand-parent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elderly's life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creases with intens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gender difference lies in grand-parenting of migrant elderly, and that life satisfaction declines for females and increases for males. For non-migrant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may increase regardless of gender difference. We also find that life satisfaction is affected by age, education, income, heal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support.

**(15) A rethink of post-modern film theory**

*LAN Fan · 130·*

Postmodern film theory or post-modern film theory is a "reversed" extension of classic film theory and modern film theory. "Rhizome" in the 21st century film theory has shown that the film theory has developed from a one-way development to an "interwoven mesh". Dualism of experimental spiri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not digital but image creation of CG and VR) and many other factors have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film theory, which predicts the possible breakthrough in film concepts and technology.

**(16) Gombrich's theory of visual art in China**

*GAO Shang-xue · 135·*

Gombrich's theory of visual art spread quickly in China in the 1980s but sank into oblivion in the 1990s. This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wo reasons. Denial of the sociality of image is a basic flaw in the theory. In addi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artistic ideas and concepts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rt since the 1990s poses fierce competition for it.

**(17) Value orientation for cityscape design**

*ZHAO Hui-ning, ZHAO Tian-yi · 142·*

To raise the functional and aesthetic value of cities, cityscape desig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all factors in that cities have various complex systems for material,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cityscape design needs to prioritize culture and history. Meanwhile a balanced urban ecology should also be a prime consideration.